



印复旦园

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管理委员会
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
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
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复旦分校

编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爱心、奉献

——序《心印复旦园》

王小林

在我兼管退管会工作不久，陆昌祥同志就将编辑出版《心印复旦园》纪实文集的计划报给了我。我仔细看了计划和《心印复旦园》的征稿启事，觉得复旦大学退管会、退教协、老教授协会和退大分校合作编辑出版这本书很有意义，我赞成这个计划，并乐意出任本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以表示我竭诚的支持。

在退管工作联络员、退教协理事、小组长和书稿作者的热情支持下，经过两位主编、几位执行主编以及编委们的将近一年的辛苦努力，《心印复旦园》集稿 111 篇，即可交付出版了。这是我们学校老龄工作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丰硕成果。我代表学校党政领导对此表示祝贺，并对为这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委和作者表示诚挚的慰问和感谢！

《心印复旦园》分为 4 篇，即“风范篇”、“创业篇”、“师泽篇”、“缤纷篇”。打开书稿，仿佛走进时光隧道，洞见了一个个闪光的足印、心迹和情境。它们在岁月的熔炉中，凝炼成动人心弦的六个大字：责任、爱心、奉献！

旧中国积贫积弱，文化科技事业十分落后。无数志士仁人奋起努力，但由于统治者的无道而不可能真正改变面貌。新中国是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复旦、上医大的一代代专家教授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事业而奋发有为地工作，在建设复旦和上医大，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祖国服务中，表现了自觉的责任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2000 年，复旦和上医大强强联合，合并成新的复旦大学，激发了新的

活力,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新复旦继承先前的优良传统,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心印复旦园》书写和颂扬的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精神。我们知道,生命是个时间的过程,历史总是从过去走来。我们复旦大学的这棵生命之树,也是在历史过程中生存、延续、发展和壮大的,也是从过去走到今天的。复旦今天的辉煌,是在复旦和原上医大一代代人的努力和积累的基础上铸造而成的。《心印复旦园》就是对这种努力和积累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书写,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创造历史的复旦人的敬礼!

这里的“风范篇”,是献给复旦和上医大资深专家学者的颂歌。一位校友曾说过,何谓大学?大学就是要有大师。我们复旦大学虽不能说已是群贤毕至,但也是大师迭出,英才荟萃。那些杰出的学者、科学家和资深专家教授,他们在科技和学术上的探索和创造,为学校厚积了学术和科技财富;他们那不畏艰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那为人群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他们安于清贫,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我们、为复旦大学的后来者涵育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心印复旦园》记述他们的业绩,歌颂他们的精神,不只是为了怀念、赞扬和感谢,而有着更深的期待。那就是希望他们的精神之泉,能真正化为滋润今天复旦大学年轻人的雨露,使他们所铸造的复旦人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风范篇”中还有着对复旦大学一些管理干部的素描。由于作者书写角度的不同,烛照截面有大有小,他们的身影有深有浅,但他们都在复旦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这些管理干部中,有的本身就是专家学者,有的是专职干部。这些专家学者,用精深的专业造诣、创新的精神和学者的风范教育学生、影响学生,举薪传承,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当他们站到了“领跑者”的位置上时,他们又承担起管理学校的职责,推动学校的发展。至于专职干部,他们原先并不一定熟悉教育,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善于学习,他们以自己的热情、睿智、胆识和魄力,把复旦推向前进。他们在职时,恪尽职守。他们退下来以后,依然在为我们的事业、为群众服务。复旦这棵

绿荫如盖的大树，有着他们辛勤浇灌的汗水。

《心印复旦园》的“创业篇”，是我们复旦创业者自己书写的诗篇。解放初和院系调整后，我们复旦和上医大的规模如何，有多少系科、多少专业，有多少值得自豪的科技成果？历史前进了50年，复旦已今非昔比了。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它以挺拔的英姿，站到了共和国教育事业、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前沿。忆当年，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学科或科技空白，被我们的创业者发现后，就自担责任，自加压力，刻苦攻关。在资料信息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自己坚强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意志、创造的激情和智慧，攻克难关，填补空白，成就了新的实验室、新的学科，或者为新专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创业者，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条件下，他们想的不是生存的艰难，而是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有攻关任务，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哪怕顶着精神镣铐跳舞，他们也会在所不辞！他们是复旦的赤子，人民共和国的赤子。《心印复旦园》在这里记述了他们很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就是要将他们摆在历史的香坛上，给予叩拜，衷心说一声：谢谢！

《心印复旦园》的“师泽篇”，谱写的是复旦师生情浓、薪火传承的乐章。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虽然他所说的“道”和“业”都是有特指的，用于今天并不合适；但是如果我们赋予“道”和“业”以新的内容，作为老师的职责，大体上也是可以的。我们复旦的老师在教学、科研和育人中，是尽职尽责的。他们把上好课和指导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乃至青年教师，视为神圣的任务。他们关心和爱护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以他们的远见卓识，为他们指明学有专攻的方向，或者在重大课题的合作中促使他们成长，乃至作为他们在研究上获得重大成果的催生婆。他们以自己治学的经验和心得，帮助年轻人培养优良的学风。复旦大学之所以人才辈出，是与良师众多分不开的。所谓良师者，不仅要自身丰厚、教育得法，还要待生以德。我们复旦的老师就是这样的。而这种师德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对学生的爱。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对他们仍然胸怀爱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无保留地教给他们知识和技能。师恩难忘,这是我们许多复旦人的共同心声。胸怀开阔,情操高尚,儒雅风范,无愧于为人师表。这就是我们复旦的老师!为他们树立了一块光彩照人的师德丰碑,这也是《心印复旦园》所要做的。

《心印复旦园》的“缤纷篇”,所取的是日月光华,缤纷绚丽之意。我们复旦大学,是文、理、医综合性大学,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机体。我们有学者、教授、医学专家,也有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第一位的任务是育人,而育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第一线的老师从事教学,指导科研,还有众多的管理工作(包括规划管理、教学科研管理和思想生活管理等),来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生、为老师服务,为在职的人员提供支持,为那些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复旦现已荣休的教职工服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复旦为老服务的工作生气勃勃。维护退休教职工的合法权益,鼓励退休老同志老有所为、老龄工作制度化建设和落实两级管理都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在我们的老师中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管理人员中,也是人才济济。他们岗位不同,但理想追求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把复旦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红花绿叶,相映成春。这就是复旦大学落英缤纷、色彩斑斓的境界。《心印复旦园》的“缤纷篇”所辑录的,就是我们学校各种岗位上教职员工所书写的光彩业绩,以及渗透在这些业绩中的热情和忠诚……并为之高歌一曲!

《心印复旦园》,她不以史书的面貌出现,但又是历史见证者的口述历史,可以说她是复旦校史的组成部分。她生动具体,有血有肉,感人至深!《心印复旦园》,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宝库。现在,我们复旦大学在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遵循科学发展观,为把复旦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心印复旦园》的出版,将是对我校师生的精神激励,必将给我们平添无限的力量。

这就是我读《心印复旦园》后的一些感想。

是为序!

目 录

责任、爱心、奉献——序《心印复旦园》·····	王小林(1)
-------------------------	--------

风 范 篇

滴水当涌泉——怀念王中先生·····	曹 宪(3)
高山仰止说望老·····	范 晓(9)
“正谊明道”的遐想·····	冯承洛(15)
百岁老人蔡尚思先生的治学之道·····	傅德华(18)
金陵遽逝 业绩永存——痛别华中一教授·····	顾昌鑫(24)
高风垂范 音容永驻——深切怀念吴常铭同志·····	郭 诤(29)
归来又复坐书城·····	华宣积(36)
沉思前事忆师恩·····	李熙宗(40)
感受创业者的胆识与胸怀·····	卢 元(46)
深切怀念谢希德先生·····	陆 栋(51)
心灵的回荡——我与王零的陈年故事·····	陆士清(55)
我的老师周同庆先生·····	潘笃武(62)
半个多世纪的复旦情结——缅怀吴征铠老师·····	秦启宗(68)
我心中的两位院长·····	任 鹿(73)
桑榆微霞见情怀——老年志愿者钱冬生·····	申 文(78)
在复旦学报复刊的日子里·····	王华良(85)
忆恩师谭其骧·····	王文楚(88)
年高德劭 行为世范·····	温廷桓(91)

师德长存 爱心永忆	谢高阳(94)
斯人已去 怀念日深	徐端正(101)
深情的缅怀	许 荣(104)
忆苏德隆教授二三事	袁鸿昌(106)
著书立说显风范——记王运熙先生	袁震宇(109)
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蒋孔阳的最后十年	郑元者(114)

创 业 篇

深情的回眸 无限的企盼	陈才兴(123)
汗水心智编织的青春岁月——关于复旦加速器的 回忆	陈炽庆(128)
贵在坚持 重在协作——我国首例白血病病毒 分离和研究侧记	程 立(131)
我是生物物理学的一兵	程极济(135)
分析测试中心兴衰往事	费 伦(139)
与时俱进的“医学人口学”研究	顾杏元(146)
病理学——我一生的追求	郭慕依(149)
拨云见日——宗教研究的起步	胡景钟(154)
难忘灯会	胡荣生(158)
心系法学院	姜厚仁 修义庭(163)
回眸丙烯楼	李文俊(168)
回首投身社会学的足迹	刘豪兴(173)
咱们“五室”的年轻人	罗梅初(179)
健步攀登 屡创第一	马礼敦(183)
《妙手回春》映华年——怀念手外科专家杨东岳	倪定斋(190)
峥嵘岁月稠——《现代肿瘤学》编辑札记	阮天明(193)
岁月流金——忆生药学教研室双获国家奖	施大文(197)
从一张老照片想到的往事	汤金年(201)
创业艰辛苦战多	王新民(208)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之研究	王永铭(214)
攻坚不怕难	翁志根(218)
从物化实验教学“灯会”说起	项一非 蔡显鄂(221)
我与《汉语方言大词典》	许宝华(227)
参与力学实验室建设的回忆	许经民(233)
白衣赤子 天使情怀——记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 血防斗争	俞顺章(240)
开创卫生微生物学的未来	郁庆福(246)
创建电子学科的回忆	袁 桀(252)
心诚志坚 终成正果——口蹄疫病毒基因工程 疫苗的诞生	郑兆鑫 郭杰炎(258)
我与电子显微镜室之情缘	钟慈声(263)
发扬艰苦办学的传统	周 容(267)

师 泽 篇

正其谊 明其道	白之娟(273)
教泽绵延	陈克明(276)
我与恩师余开祥教授	陈其人(279)
华中一剪影	陈仁溪(283)
师恩永驻心头	刁承湘(285)
几笔流水账 一份不了情	杜作润(290)
历史的光彩不应泯灭——我是怎样走近王造时 教授的	何碧辉(296)
学为人师	何开玲(302)
陈珪如教授教我辅导马列哲学著作	金邦秋(307)
灌溉者的心血	李 平(311)
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	陆谷孙(315)
涛声依旧	陆士清(321)
在江泽宏教授病重的日子里	史家定(327)

玉兰花开	苏兴良(330)
我们的卢元老师	王德宏(334)
回望淮矿忆恩师	王籀兰(338)
一个辅导员的感悟	吴丽娣(345)
怀念胡裕树先生	严修(349)
师生友谊之树常绿	颜玲(354)
领悟创新——追踪寻迹望道先生	宗廷虎(360)

缤 纷 篇

敬爱的周总理三次接见我	曹小定(367)
理论思想的火花	陈勤(372)
人民代表为人民	陈国新(377)
难忘同窗情	陈惠黎(382)
忆留学生教学	戴卫国(386)
难忘的西藏 难忘的岁月	葛乃福(389)
“回上海啊！回上海！”	谷伯起(393)
难忘的几段记忆	华宏鸣(397)
红十字运动薪火相传	黄志昌(402)
深情在心中	蒋以山(406)
此情可待成追忆——校园里的金婚庆典	金文英(409)
友情之旅——访苏追忆	李继宗(417)
我说——“祸福的倚伏”	林帆(421)
一本获奖图书的诞生	林溪波(425)
情系乐苑都是爱	林相荣(429)
我与回民食堂	马培英口述(434)
异国师友情	潘富恩(437)
草根文化学问深	秦耕(440)
祖先的智慧——“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分析	任炽刚(445)
郁闷的感觉	沈文龙(448)

从九十年代的考研热说开去	童月妹(452)
光源情——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光源照明工程的回忆	王国富(455)
一段难忘的经历	王蕙仁(457)
蒋学模教授创造的记录	王克忠(461)
我和谢高阳	王新民(464)
与苏老在衡山宾馆相伴百日	王增藩(470)
我的“仕途”生涯	王振钺(475)
巴蜀行 校友情	邢蒂蒂(479)
漫步校园寄深情	姚桂根(483)
在母校怀抱中成长	余赛妹(486)
在迎战甲肝爆发的日子里	俞顺章(490)
“逝水流年”中的絮语	张传座(494)
复旦烟云	张薰华(497)
雪域高原留足迹	郑天心(500)
我的“名记者梦”	周胜林(504)
校园处处足印深	周永忠(508)
“名人档案”储芳华	周芷芷(512)
后记	方林虎 陆昌祥(514)

风 范 篇

滴水当涌泉

——怀念王中先生

图书馆 曹 宠

悠悠岁月，人生几何。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在不经意间偶遇某人某事，遂决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命运。对于我来说，王中先生的知遇之恩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每当忆起和恩师王中那段相遇、相识、相处、相离的往事，我的心境就难以平静。

1949年上海解放，我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考入“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学习，时值王中先生作为上海军管会新闻室的军代表接管了中国新专，并筹建华东新闻学院，成了我们的师长和领导。他穿一身洗得快发白的黄军装，军装长得近膝盖，看上去有些土，但一把挎在腰间的小手枪，却显出了他的威风。他直率坦荡，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初次接触革命军人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当时在我心中升起一种对“人”的全新感觉，觉得“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他给我们作的第一次讲话，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是来干革命的，是来吃苦的，我们欢迎。我们刚刚筹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你们谁要是吃不了苦，没有信心的，可以走，我们欢送。”而后，他又讲了当年“延安抗大”和一些其他革命学校的教学生活情况。大家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很快投入了编班、座谈、听讲座的新生活，当然，也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偷偷地开了小差，溜走的。我和后进入复旦中文系的杜月邨同志编在四班，经济系的洪文达同志在五班，复旦附中的赵成德同志则在一班。杜月邨是班干部，新闻系余家宏教授是辅导员，王中为教务长。我接触最多的是王中，听他的报告和讲话也

最多,尤其是我作了学生会干部,致使他对我有一定的印象。

1956年春天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找到王中先生,时隔七年,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当时校总务处长孙保太正在向他汇报工作,我就坐在一边等候。孙保太和他的谈话结束后,他点上一支烟,就问起我的近况来。我说,现在已从部队复员回老家,并把自己在部队的工作情况和表现,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因历史社会关系等受审查的详细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当时我因在肃反中受了点委屈,情绪有些冲动。我说:“肃反结束后部队要我转行到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不能再搞新闻摄影,我一气就要求回老家种田,连复转回上海都不来,但回家后却陷入了困境。”瞧着我那种情绪,他当即批评了我:“干革命哪能闹情绪,记得参军时我是怎么嘱咐你们的?”我无言以对。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现在你想怎么办?”我说:“我想重回新闻队伍,来新闻系读插班生。”他顿了半晌,认真地说:“书就不用读了,现在新闻系正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你在战场上搞过摄影采访,也许我们能用得着。”他又问:“你的档案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江阴民政局。”他一挥手说:“你回去吧!我们研究后会把结果告诉你的。”我回江阴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复旦大学的调令。1956年,一场向“科学进军”的运动在全国迅猛开展,王中在复旦举起了新闻改革的大旗,我就是在这场新闻改革运动的热潮中,被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

来复旦后,我被分配在摄影教研组工作,王中先生嘱咐我好好向舒宗侨、郑北渭两位先生学习,他们一个是老专家,一个是从国外回来的洋专家。我遵照他的教导,为自己订了个学习计划,一面当舒、郑两位先生助手,一面补读自己没读完的课程,同时也随堂听舒、郑两位先生的“新闻摄影”和“图片编辑”课。当时摄影教研组才5个人,舒、郑是正副主任,教师有马棣麟、谢恩光和我。大家都很配合,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帮助。

1957年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年,王中先生意气风发,四处呼吁,树起新闻改革大旗,我则埋头补课和进行实践拍摄,大鸣大放阶段,我也只作应景发言。不料第二天团支部干部就好心地告诫我说:“你初

来乍到,不了解复旦情况,说话要小心。”当时的暗示,可能叫我不靠拢舒宗侨先生,我一头雾水,一放暑假就回江阴老家搞农村拍摄去了。

暑假尚未结束,我即接到新闻系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整风”揭发批判王中,我不禁茫然。时任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被错划为新闻界党内大右派后,受到了批判。在新闻系所有整风批判的大会小会上,我都躲坐在角落里打瞌睡,后来我逢会必打瞌睡的习惯也许就在这时形成的。

1958年春,我被下放到宝山大场葑溪乡,背着“王中追随者”的问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此我和王中先生两隔,直至1960年5月,我从葑溪乡返校,才在新闻系资料室见到了王中先生。当时两人相对无言,我告诉他我已调到校图书馆采编部工作。

1961—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百姓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己每月28斤的定量,上交一斤,肉票也全上交了。因为我是个共青团员,国家有困难,理应共甘苦。但是,我想“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是毛主席倡导的“南泥湾”精神。于是我就在家养鸡养兔,在图书馆周边的空地上(今理科图书馆)种植瓜、豆、蔬菜,如丝瓜、扁豆、蓖麻等等,更在图书馆和“四幢楼”之间开了一块空地,和同馆来自农村的王鸣楚种植了一大片山芋。张世春也迎头赶上,在馆后种了一大块南瓜地。我们三个人来自农村,种过田,也吃得起苦,一下班就接着干。当时这些作物长势良好,硕果累累,解决了很大的“肚皮”问题。这时我常去王中先生家,他上有老母,儿女尚幼小,吃口多,看着他家的困难,我总是带些丝瓜扁豆之类的东西去,并在出版科工作的王师母陈毓英同志拉拉家常。我在部队时在山东住过一阵子,因此说起山东荒年时的情景。她说:“山芋藤是个好东西,荒年时可救过不少人的命!”此时我那块山芋地正长势旺盛,我就成捆地把山芋藤的嫩头部分往王先生家送。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王中先生相遇时,绝不再谈工作。也许人们不喜欢在困难时期再去多想那些懊恼与悲怆,而是更愿意回忆一些美好和奋发的日子。我始终没听见王中先生再谈论反右,好像他把这些不公正、不愉快的

事儿都给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各自忙于学习和改造。咫尺天涯，难得一见。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拨乱反正时，馆里来了个副馆长，在欢迎会上，我一看竟是王中先生。真想不到，转了一圈，他又变成了我的“同行”，我不禁感慨系之。

直到1979年的一天，他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再次出任新闻系主任时，他找到我说：“古时候，一人犯法，有株连九族之说，想不到五七年一案，竟把你当‘十族’诛了。”

他问我：“你还想回新闻系吗？”时过半百的我，人虽未老，可心却有些累了，俗话说：“当作家是愈老愈好，当摄影记者是愈年轻愈好”，搞摄影教学，自己也缺乏坚实的基础，何况这二十年的荒芜，也跟不上趟了。我就说：“王先生，这些年来，我在图书馆也习惯了，这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读了不少书，挺安心的。”他见我已无去意，淡淡一笑说：“那也好，人只要有决心，有志向，总会过得很充实的。”就这样，我又一次离开了王中先生。生活就是这么平淡，更无须怨言。只是后来，我在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分校图书馆系兼了门“报刊工作”课（后改名“期刊管理”），并在新闻系兼开了“新闻摄影专题”课，更在复旦新闻系创办的“新闻大学”和“新闻学译丛”上写过几篇有关摄影方面的文章。

不过，我这一生，是永远联系着王中先生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在我看来，他的晚年有些悲凉，我为这曾经掉过伤心的眼泪。

上世纪80年代，当王中先生精神焕发，身担重任，对新闻学研究取得多方面成就，正拟向新的目标奋力前进、为新闻学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关键时刻，他病倒了，患了脑萎缩症。从1985年起病情逐渐严重，言语遭遇困难，生活更难自理，虽时有新闻系的师生前去看望和安慰，然天长日久，总有困难。他子女还都在上班，总不能日夜陪护，虽为他请了个住家保姆，但总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而尽责的人。

我每次走进他的卧室，总有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室内凌乱不堪。待到后期他的饮食全吃半流质，杂七杂八一牛奶锅，由保姆喂食，保姆没耐心，一匙不停地快往他嘴里送……我目睹此景，不免心酸。后

来，我给他找了个浙江姓张的阿姨，侍候得尚可，尤其在他住华东医院期间，一连数月，日夜都在病房陪护。我去探望过几次，他虽言语困难，但精神依然舒畅。出院回家后，张姓保姆因患肝病回乡，使先生又陷困境。自回家后一连找了四五拨保姆，少则几天，多则半月，总嫌他家脏累报酬不高，掉头离去。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王先生仰卧在床，20岁样子的小保姆，放着王先生不管，却在门外和别人大侃“山海经”。时间快到十一点半了，我问王先生，中饭吃了吧？他无奈地摇摇头，我不禁伤心泪落。

晚上，我和他小儿子王力商量，他也叹着气说：“我正在重新找呢！”后来，又找了个年过半百的老阿姨，室内似乎有了些热气。过了几周，我外出归来，再去探望王先生，室内就更热闹了，大人、小孩济济一堂，正在包饺子呢！老阿姨说是从乡下来的兄弟和孩子，要住一阵呢！王先生一个人还是孤零零地躺在他的角落里。在和王力商量下，我决意为王先生重找一个合适的保姆。我多方联系，终于在福建武夷山市（崇安县）找到了一个中年妇女邢丽贞。介绍她的人是我的学生，这下我才放下心来。邢丽贞来后，室内室外，立时有了改观。三顿饭食也调融了，房中的尿臭也散去了，王中先生的病体似乎有所好转。有一次去看他，他用含糊的语句告诉我，他要出去走走，他要买瓶“发蜡”把头发整理一下。

“王先生没有垮！”我心中升起一丝欣慰。于是，我和邢丽贞用车推他从国年路转到了政肃路上，在复旦百货商店门前，他让我去买发蜡，恰好没货，没买成，此事终成遗憾。

后来，邢阿姨告诉我：“老先生虽然疾病缠身，但精神依然洒脱，并无半分悲观，虽然言语困难，但神志依然清楚。他很有兴味地听我讲述自己家乡的民间传闻与琐事，而且听后总是若有所思。他体恤下人，因长期卧床，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清洁卫生诸多不便，要求起床便溺，我一人力弱，扶持困难，他叫我用布带捆扎床头木架上，自己用手拉起身子，而后由我扶起。”

我由衷地钦佩王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关怀后辈和对生活的坚毅。正如1993年在复旦召开祝贺王中教授从事新闻工作五十五周年的